

懷念戴仲甫兄

杭立武

仲甫兄和我是五十多年前在中央大學的同事，那時正是北伐成功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他從日本回國在北師大任教不久，轉到中央大學任物理學教授，我從英國回來不久任中央大學政治學教授，因為他在理學院，我在法學院，教學課程性質不同，所以平日接觸的機會較少。

二十一年，母校金陵大學為加強教授陣容，請他擔任物理系教授，後來又曾兼系主任。因為我任金陵大學董事會的董事長，為了教學的發展，設備的充實，所以在會議上或其他場合，常有和他晤談的機會。尤其是抗戰發生，政府西遷重慶，金大遷到了成都，他也去了成都。我當時任教育部政務次長，常因公去成都，也就順便去金大與校友們晤談，遂得與仲甫兄偶常見面。

仲甫兄是典型的學者，也是典型的教育家，他為人嚴謹、耿直、平實、負責，不論教學研究，或討論什麼問題，他都非常認真。他對學生的

作業，實驗的報告，要求十分嚴格，一定要達到他所希望的水準，否則他會指責不力之處，甚至到學期結束時給予一個補修或補考的評分。在出席校內外各種有關教育問題的會議上，他也從不放縱他的尺度與標準，他不同意降低大學教育的水準。目前在國內外物理學界若干有成就的物理學者，其中有不少是他的高足，當年受過他的嚴格教誨，我想他們對於戴先生的嚴格訓練，與目前他們的成就，會感覺有莫大的影響。

抗戰勝利後，臺灣光復，那時我尚任教育部政務次長，協助朱驥先部長策劃教育復員，臺灣因受日本五十年的管制，教育制度因襲日本，所以教育方面的接管，需要瞭解日本教育情況的人來辦理，我就推薦仲甫兄協助陸志鴻先生來接收臺北帝國大學，他不僅擔任他本行的臺大物理系主任，且也曾擔任教務長。

大陸陷匪，中央政府遷臺後，當時我任教育

部長，曾和他幾次見面，後來我出使泰國、菲律賓、希臘等國，和他見面的機會減少。可是就在這時期，他在教學研究的領域，却大大開展，奠定了臺大物理系的基礎，他在臺大物理系首先創設了核子研究室，而且協助籌備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，該所成立之初，第一年的研究生還在臺大物理系上課。

後來他又負責恢復中央大學，由辦理地球物理研究所開始，腳踏實地，埋首苦幹，由研究所而學院，現在中壢的中央大學，可以說是他的心血、精神、智慧和毅力積累而成的。

所以中壢地方人士在校園安置了他的銅像，這種尊榮，他可受之無愧，更可為後輩青年做一個好榜樣。

本（七十一）年四月四日，他遽爾辭世，轉瞬已逾半年，回憶往事，不勝悵然，謹撰短文，以示無限的懷念。